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施特劳斯(Leo Strauss) ● 著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Xenophon's Socrates

高诺英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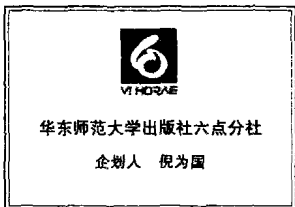
Xenophon's Socrates

[美]施特劳斯(Leo Strauss) ● 著

高诺英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美)施特劳斯著;高诺英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8545-4
I. ①色… II. ①施…②高… III. ①色诺芬(约前
431~前355)--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0125 号



Xenophon's Socrates

by Leo Straus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72 by Cornell University; copyright renewed 2000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251 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美)施特劳斯 著

高诺英 译

责任编辑 刘丽霞
封面设计 董贇贇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
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6.5
字 数 12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545-4/B·625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正则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容易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年

中译本前言

彭 磊

1938年秋,施特劳斯从欧洲乘船远赴美国,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新校(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任讲师。在新大陆的头几年,施特劳斯一边忙着备课,一边忙着四处筹钱缓解财政困难——当时他早已不是刚出道的毛头小伙,而是有家室的四十岁中年人。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施特劳斯却无比沉醉于色诺芬的发现,在与克莱因的通信中,他难掩阅读色诺芬激起的狂喜,禁不住连连唏嘘:“色诺芬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人物”,“我特别喜爱色诺芬”,“他奇妙绝伦,无可争议地是我最喜爱的作家”。^①期间,施特劳斯写下了疏解色诺芬的短篇作品《斯巴达政制》的文章:“斯巴达的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此文是施特劳斯在美国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施特劳斯后来承认,此文写得非常“大胆”。

从那时起,施特劳斯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色诺芬。1948年,

^① 参见《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以下简称《回归》),朱雁冰、何鸿藻译,华夏出版社,2006,页298,291,299。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①发表——该书是施特劳斯第一部以疏解古典作品为形式的著作；1958年的芝加哥大学讲座“政治学问的起源与苏格拉底问题”第四讲专讲色诺芬（着重于《回忆苏格拉底》、《齐家》）；60年代，施特劳斯曾在课堂上教授《居鲁士的教育》，^②书评“论古希腊史家”解析了《希腊志》的某些要害处；及至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施特劳斯又沉醉在色诺芬的文字中，完成了对色诺芬的四部苏格拉底作品的疏解（即1970年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1972年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就在1973年，病重的施特劳斯还念叨着“以一篇讨论色诺芬《上行记》^③的文章的形式，写出我跟学问——世界的告别辞”^④；三个月后，施特劳斯撒手人寰，“色诺芬的《上行记》”成为他生前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

确如施特劳斯所言，他“对色诺芬怀有近四十年的景仰”^⑤。值得深思的是，施特劳斯从未就柏拉图或修昔底德或阿里斯托芬说过同样的话。出于现代的智识偏见，色诺芬自18世纪末便声望渐落，在20世纪更是完全被哲学家们遗忘，唯独施特劳斯对色诺芬情有独钟，投以极高的敬意。然而，究竟施特劳斯为何如此景仰色诺芬，却很难说得清。

问学者若能在古圣先贤中寻得一位“灵魂的伴侣”，实属美事幸事——既幸福，又幸运；不少人就算皓首穷经，天天跟古人打照面，可是却不能走进哪位圣哲的心灵，究其原因，不能怪人

① 参见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何地译，华夏出版社，2006。

② 克雷，《一种被遗忘的阅读》，载《经典与解释5：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华夏出版社，2005，页39—41。

③ [译按]又译《居鲁士远征记》。

④ 《回归》，前揭，页481。

⑤ 同上，页471。

家治学不努力,只能怪其脾性跟古人不对,脾性不对还强拧在一起,只可能是貌合神离。能够和圣哲倾心相交,或者说能被圣哲接纳,端赖个人的造化和天分,施特劳斯能够由喜爱至敬仰再至深刻理解色诺芬,想必也有情志相投的原因。从一个人的喜好,可以看出其人之秉性。孔子弟子南宫反复念咏《诗经·大雅》中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孔子看到了,觉得这位弟子言行谦谨,便“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另见《论语·公治长》)。仅因为弟子读了一句诗便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他,这在今天也许是无法想象的。施特劳斯坦言,自己喜欢简·奥斯汀胜过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熟悉二人作品的读者恐怕都有体会,奥斯汀的文字温婉而节制,带着一种英国淑女的优雅;陀氏的文字则残酷而直逼灵魂,让人感到从“地下室”、“死屋”蔓延来的阴冷(从而更讨尼采喜欢)。施特劳斯还说,喜欢奥斯汀的读者更容易接近和理解色诺芬,因为,和奥斯汀类似,色诺芬笔法克制,尽可能避免展示丑恶的东西,他的写作原则是“记住那些美好的而不是丑恶的事情,这是高贵、正义和虔敬的,而且也令人愉快”(ἀλλὰ μὴν καλόν τε καὶ ὄσιον καὶ ἥδιον τῶν ἀγαθῶν μᾶλλον ἢ τῶν κακῶν μεμνήσθαι, 见《上行记》5. 8. 26)。① 既然施特劳斯喜爱奥斯汀和色诺芬,我们不难推想,他天性温和而古典,热爱美好、高贵、正义、虔敬,而且,作为作家具有很强的道德感,抵触任何激烈或过度的东西。②

施特劳斯以一篇讨论色诺芬的文章来告别世界,这有时会让人犯疑,这篇文章中的色诺芬是否就是施特劳斯的一幅“面具”?《上行记》记述了色诺芬的政治行动和演说,某种意义上算

① 参见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前揭,页201。

② 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张辉选编,华夏出版社,2003,页18—19。

是色诺芬的自传——借解读《上行记》，施特劳斯是否在为自己的一生作注解？

色诺芬之于施特劳斯的思想和不啻为一座要津。在转入色诺芬之前，施特劳斯的“专业”是犹太哲学研究，“副业”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研究；他从当时如日中天的柯亨新康德哲学起步，专注于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圣经》—宗教批判，然后旁触到霍布斯与古典传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关系，进而上溯至中古的迈蒙尼德和伊斯兰教哲人（表面来看，这番回溯是历时性，但其实全在施特劳斯年轻时最一开始的问题视野中，只不过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渐渐展开而已）。这番回溯性的思索逐渐使施特劳斯意识到一个跟自身紧密相关的问题：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恰如斯宾诺莎和迈蒙尼德昭示的那样，哲学对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并非无害，社会对哲学并非没有偏见，问题在于如何既能保全哲学，又能保护社会。在研读迈蒙尼德时，施特劳斯发现，这位被视为“犹太教的基础”的“犹太人”根本不是犹太教徒，而是激进的哲人，但如果公开这一秘密，势必会对犹太教和迈蒙尼德构成极大的挑战。为此，

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我想以非犹太人为对象。我选择了色诺芬，部分因为他与苏格拉底问题有关，部分因为我对迈蒙尼德的猜测恰好切合这样的情形：如果即便像色诺芬这样一位看起来无害的作家，也会用或用过隐微写作术，那么，像迈蒙尼德或柏拉图这样并非像色诺芬那样看起来无害的作家，就更会用这种写作术了。^①

^① 1945年施特劳斯致犹太哲学家古特曼（Julius Guttmann）信函，转引自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林国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页218。

照此看来,施特劳斯选择色诺芬大致有三方面的考虑:避免直接冲击犹太教;色诺芬与苏格拉底问题有关;色诺芬作为隐微写作的典范。施特劳斯没有明说色诺芬如何与苏格拉底问题有关——倘若抛开策略上的因素,苏格拉底问题是否才是施特劳斯钟情于色诺芬的原因所在?

可是,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不同样与苏格拉底问题紧密相关吗?色诺芬之于苏格拉底问题有何特殊意义?在讲座“政治学问的起源与苏格拉底问题”中,^①施特劳斯直接处理了三种苏格拉底形象:阿里斯托芬《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个纯粹的哲人,是“非政治的”和“无爱欲的”,缺乏自我认识;色诺芬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相一致,是“政治的”和“爱欲的”,具有自我认识,但是,唯有色诺芬塑造的苏格拉底是“唯一的公民、唯一的政治家、唯一的领袖”(the citizen, the statesman, the captain),从来没有任何哲人及政治家像苏格拉底那样具有政治性。假如说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最哲学,那就可以说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最政治;但施特劳斯还提醒我们,尽管苏格拉底深具政治性,但他还是“某种别的东西”(he was also something else),因为苏格拉底与居鲁士构成色诺芬作品的两端,既然居鲁士是纯粹政治的君王,这决定了苏格拉底决不可能只是政治的,否则就不成其两端(中译页 53,英文页 165)。不难猜到,“某种别的东西”就是哲学。施特劳斯为什么不直接说这种东西就是哲学呢?首先是因为色诺芬从未明说苏格拉底还是哲学的。色诺芬以四部作品展示了苏格拉底

^① 中译参见《经典与解释 8: 苏格拉底问题》,华夏出版社,2005,页 2—85。笔者同时参考了英文原文,见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Winter 1966, Vol. 23, No. 2, 页 127—207。以下凡引用此文,随文注出中译和英文两种页码。

的不同侧面,但他始终避免展示苏格拉底与第一流的人们(first-rate men)的交谈,甚至避免用最高级来形容苏格拉底,这使得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显得很平凡,谈的都是很日常的事情,简直完全与哲学无关。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柏拉图那里,苏格拉底有时倒很哲学,起码有著名的辩证法和理念论,而且总是跟第一流的人们或者“精英分子们”交谈。施特劳斯承认,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话(尤其《王制》和《治邦者》)中的苏格拉底对政治事物的分析基本一致,差别仅仅在于,“色诺芬比柏拉图简洁、矜持或害羞得多”[(much more laconic, reserved, or bashful),中译页 52,英文页 173]。这种差别就反映在两人的写作艺术上。柏拉图与色诺芬的写作都具有上升—下降的结构,但却有着重大差异。柏拉图往往上升到顶峰后开始下降,而色诺芬忽略顶峰,在上升到顶峰的途中便开始下降:这并非意味着顶峰不存在,而是色诺芬不愿展示这顶峰(出于羞耻感?),但他会暗示或指向顶峰。这一笔法的典范就是《回忆苏格拉底》卷三。该卷第一章至第三章展示苏格拉底与一些不具名者的交谈,第四章至第五章展示苏格拉底与具名的熟人的交谈,第六章展示苏格拉底与阿里斯通之子格劳孔的交谈,第六章展示苏格拉底与卡尔米德的交谈。与苏格拉底交谈的对象渐次升级,由不具名者上升到亲近的熟人,再上升到格劳孔和卡尔米德,格劳孔是柏拉图的亲兄弟,卡尔米德是柏拉图的舅舅,而且苏格拉底是出于“卡尔米德和柏拉图的缘故”(色诺芬在作品中唯一一次提到柏拉图的名字)关心格劳孔,如此种种都令我们期待苏格拉底接下来会跟柏拉图交谈。柏拉图应当是这次上升的顶峰,但在第八章,出场的不是柏拉图,而是阿里斯提普斯,虽然同样是一位哲人,但却是比柏拉图逊很多的哲人。我们期待的顶峰没

有出现,但上升已经完成,下降已经开始,苏格拉底转而与具名的工匠、名妓交谈(第十章至第十一章),最后又回到与不具名者的交谈(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①除此之外,我们甚至可以说,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比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下降得更低,因为,柏拉图从未展现过苏格拉底与工匠的对话,至于女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只在言辞中忆述过自己与两位女人的谈话(《会饮》中的蒂俄提玛和《默涅克赛诺斯》中的阿斯帕西娅[Aspasia]),但我们只亲眼见到一个女人且只见到过一次,也就是苏格拉底的妻子克珊提蓓(Xanthippe),结果还让苏格拉底请了出去(《斐多》60a)。^②

色诺芬避免展示最高的东西,确切地说,是他笔下的苏格拉底隐藏了最高的东西。有赖色诺芬的绝世笔法,我们看到了一个把自己的哲学巧妙隐藏起来的苏格拉底。原本是哲人的苏格拉底隐藏自己的哲学,正是出于对政治事物的深刻思考和对哲学的自我认识,这使他获得了节制或明智[(*σοφροσύνη*, moderation),中译页 49,英文页 171],并由此成为最政治的人。在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三位作家笔下,以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最政治。毋庸置疑,通过发扬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就可以使如今已经忘记政治的“哲学”重新成为“政治的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如此看来,施特劳斯致力于诠释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可谓用心良苦,是为重启“苏格拉底问题”,亦是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伟大行动。理解施特劳斯的色诺芬,也就成了修习政治哲学智慧的重要一关。不过,施特劳斯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取法色诺

^① 参见 Leo Strauss, *Xenophon's Socrates*, St. Augustine's Press, 1998, 页 73-74。

^② 参见 Leo Strauss, *City and Man*, The Uni. of Chicago Press, 1964, 页 57。

芬,在写作方式上也予以效仿——既然色诺芬隐藏了最高的东西,施特劳斯想的当然不是直接把这隐藏的东西说出来,而是审慎地考虑如何说不可说的东西。他以平实淡然的文字复述色诺芬的作品,于不经意处留下细微的指示,指引我们去揣摩那最高的东西。因此,阅读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的解读,需要敏锐的感受力和极高的智力,对我们既是不小的挑战,也是极为有益的锻炼。

至于本书,施特劳斯的两位亲炙弟子均在序言中强调,施特劳斯教授的解读极为深幽和隐微,看似很好理解却因而难以理解。这种难以理解就在一些让人挠破头皮也不得其解的说法上。比如,色诺芬在《会饮》中安排了一个叙拉古来的戏班班主,并让他在演出的间歇指控苏格拉底搞哲学(见《会饮》第六章);在结束对《会饮》的解读时,施特劳斯陡然转向这一问题:

至于色诺芬选择一个叙拉古人作为苏格拉底的对
手,我恐怕其解释或许取决于如何解释“叙拉古的忒米
斯托根尼”(Themistogenes of Syracuse)——一部与
色诺芬的《上行记》难以分别的书的作者。(《希腊志》
III. 1. 2)

施特劳斯为什么以这一问题作结?按照施特劳斯的文献指
引,我们在《希腊志》第三卷(前两卷主要记叙雅典的内乱、三十
人僭政)的开头读道:

雅典的内乱就此结束了。不久,居鲁士派信使到
拉齐戴蒙,要求拉齐戴蒙人证明自己是他的好朋友,正
如他在对雅典人的战争中是他们的好朋友一样。督察

官们觉得居鲁士说的有道理,就派他们当时的舰队司令萨米乌斯(Samius)听居鲁士调遣。实际上,萨米乌斯积极响应了居鲁士对他的要求,跟随居鲁士远征:至于居鲁士如何调集了一支军队,如何率军远征自己的兄弟,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居鲁士是怎么说的,之后希腊人又如何从海路安全返回——这些都由叙拉古人忒米斯托根尼写下了。

西方古典学界喜欢争论叙拉古人忒米斯托根尼到底是实有其人,抑或只是色诺芬的另一个化名;忒米斯托根尼写下的是一部与《上行记》类似的著作,抑或就是《上行记》。施特劳斯难道也是把《会饮》中的叙拉古人等同于《希腊志》提到的这位叙拉古人并进而等同于色诺芬本人吗?^①

为了消除疑问,我们需要参考施特劳斯的另一篇文章。^②在讨论色诺芬的《上行记》时,施特劳斯简略分析了书名、篇首和作者身份,并明确谈到色诺芬与忒米斯托根尼的不明关系。他从人名的含义入手,先说“色诺芬”的含义是“异乡人的杀手”,“忒米斯托根尼”的含义是“正义之子”,并说忒米斯托根尼可谓理想化的色诺芬;施特劳斯同时看似无关地指出,当色诺芬在《上行记》中提到《希腊志》中前去辅佐居鲁士远征的斯巴达舰队司令萨米沃斯时,称他为拉齐戴蒙人毕达哥拉斯。^③“萨米沃

① 施特劳斯的后学 Robert C. Bartlett 在解读《会饮》时就取这种看法,见刘小枫编,《色诺芬的〈会饮〉》,华夏出版社,2006,页 278 注释 1。

② 见《经典与解释 13: 色诺芬的品味》,华夏出版社,2006,页 33—65,尤其页 34。

③ 事见《上行记》I. 4。参见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97,页 12—13。

斯”在希腊文中的含义是“萨摩斯岛的”，所以施特劳斯说，“《回忆苏格拉底》的作者一听到萨米沃斯这个名字，就想起著名的萨摩斯岛的哲人毕达哥拉斯，这一反应不足为怪。”施特劳斯似乎在对解释《会饮》时留下的疑问做补充说明，但读到这里，我们的疑问有增无减：为什么说忒米斯托根尼是理想化的色诺芬，又是何种意义上的理想化？为什么说色诺芬把萨米沃斯当成毕达哥拉斯不足为怪？为什么在讨论《上行记》时把色诺芬称作《回忆苏格拉底》的作者？施特劳斯虽然两次论述色诺芬与忒米斯托根尼的关系，但其观点依旧模糊不清。

令案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在1939年8月致克莱因的信中，施特劳斯提出了一种让人乍舌的解释。^① 其实，《会饮》中的这个叙拉古人压根儿不是那位身份未卜的忒米斯托根尼……那又是谁呢？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色诺芬在自己的作品中让柏拉图指控苏格拉底搞哲学！证据焉在？施特劳斯交待了其中一个线索。会饮结尾，叙拉古班主放弃了前面的表演方式，改由两个演员表演狄奥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的新婚，施特劳斯指出，这里的狄奥尼索斯(Διώνυσος)暗指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Διονύσιος)，也就是与柏拉图后两次西西里之行关系纠葛的那位僭主。伊壁鸠鲁称柏拉图为“狄奥尼索斯的谄媚者”(Διονυσοκόλας)，一是因为柏拉图的伶人行当，如《会饮》中所见，另是因为柏拉图与狄奥尼修斯的关系。照此来看，早在伊壁鸠鲁之前，色诺芬就暗地把柏拉图当成“狄奥尼索斯的谄媚者”了。色诺芬是在贬损柏拉图吗？不是。《会饮》中有一个善搞笑的小丑菲利普斯(Philippos)，他要为苏格拉底辩护，用比喻的手段来挖苦叙拉古人，苏格拉底却制止他，说，“假

^① 见《回归》，前揭，页305—306。

如你说你在各个方面都比他好,那你现在就是在侮辱他了”。施特劳斯认为,菲利波斯就代表色诺芬自己,苏格拉底的话其实表达了色诺芬对柏拉图的至高赞赏,亦如《回忆苏格拉底》以柏拉图作为顶峰一般。

叙拉古班主、叙拉古的忒米斯托根尼、理想化的色诺芬、柏拉图四者纠结在一起,究竟该如何解决叙拉古人的疑案呢?除了色诺芬留下的谜团,施特劳斯又给我们留下了新的谜团。

2010年2月27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